

一、金錢社會與文明不安全

金錢是萬能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蹟，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裏，從一個低度發展的貧窮經濟體躍升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封閉經濟體轉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高鐵、高速公路、機場、港口、城市樓房林立，無一不反映出這個社會所創造的財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預見着中華文明的復興或者再次崛起。

然而，在物質財富崛起的同時，中國社會也在快速並且和平地演變成為一個赤裸裸的金錢社會，人們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富的同時，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面臨不確定性的不僅僅是社會底層尤其是窮人，而且還是社會的各個群體。實際上，較之窮人，富人、官員和知識界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因為這些群體是這個社會最大的「利益相關者」。

不確定性說明了甚麼？財富的增加和積累，並沒有導致中國社會這個「共同體」同樣的發展；相反，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這個「共同體」在衰落，這個社會「共同體」在抽象

層面可以稱之為「文明」。如果這個「共同體」衰落了，何來文明的復興呢？

為甚麼財富的增加會導致不確定性？為甚麼財富的增加會導致社會「共同體」的衰落？為甚麼財富的增加會導致文明的不確定性？歸根到底，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文明的根基問題。

財富對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貧窮就會挨打」仍然是硬道理。但除了財富，支撐一個社會或者文明還需要「軟力量」，即道德體系。鮮有人會認為，簡單的金錢就可以組織和支撐起一個社會或者文明。沒有了道德體系，這個社會和文明就會是一袋鬆散的「土豆」。不管怎麼說，更多的人會認為，較之金錢，道德體系才是一個社會或者文明的主體。

從世界歷史看，人們並不用過於擔心舊的道德體系的衰落。道德體系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世界各文明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都會面臨道德體系重建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也並不在於財富的增加，不在於道德的衰落，而在於金錢變成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錢本身被視為了「道德」。

為甚麼會造成這種局面呢？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是政府方面的因素，即改革開放以來長盛不衰的

GDP 主義，或者說，過度追求經濟的增長而忽視了社會建設。比較地看，改革開放以來所引入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最為原始的資本積累過程。

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出現了「一切為了資本」的現象，無論是民營資本或者國有資本，都把金錢推到如此高的程度。正因為這樣，近年來隨着經濟下行，當政府轉向經濟結構調整時，很多政府官員表現出無所適從，不知道該做些甚麼。除經濟之外，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建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政府官員無所事事就是 GDP 主義的精神遺產。

其次，商業對社會的控制甚至遠超政府，對社會道德的解體產生了政府產生不了的作用。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往往是硬控制，很容易被人們感覺到，但商業對社會的控制往往是軟性的、靜悄悄的和平的。

對大多數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來說，需要甚麼、不需要甚麼，很大程度上已不完全能由自己決定，而是由商界決定，因為人們能夠取得甚麼資訊、不能取得甚麼資訊，並不取決於自己，而是商界，像阿里巴巴、騰訊和萬達等大企業。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幾乎已經形成了真正的「供給側經濟」，即供給產生需求，而非相反。

再次，金錢崇拜風盛行。今天，金錢崇拜某種程度上已經儼然成為「國教」。法國社會學家勒龐曾在其《烏合之眾》中寫道：「群眾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

邏輯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獨不相信現實生活的日常邏輯。」就中國社會來說，還可以加一句，一旦和錢發生關係，群眾就幾乎沒有了任何邏輯，甚麼都信。

這很容易解釋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各類「理財風波」。發財風流行全國，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和許多角落，就給那些唯利是圖、被稱為「騙子」的人太多的機會到處「招搖撞騙」，用他們的演說技能為有關組織和商家站台，輕易地騙取「信眾」的錢財。

這些年來，不知道發生了多少騙局，並且一旦發生一個騙局，這些騙子就廣受指責。但問題在於，為甚麼這些騙子還不斷被那麼多的組織和商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請，為甚麼還有那麼多的「信眾」呢？要知道，這些騙子都是相關組織、商家、信眾養着的。這些組織有些並非民營企業和商家，而是國營事業單位。

命繫一「錢」的中國社會

社會精英和大眾心靈的腐敗導致了社會處於一個高度不安全的狀態。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命繫一「錢」。人們只認錢，不認人。為了錢，甚麼都可以做；但有了錢，就來了不安全。老百姓仇官，因為「官」經常是「錢」的工具。官員積聚了太多的房子，不敢公佈財產。老百姓仇富，因為商界

有的掙錢不講任何道德。一旦有了錢，商人就感到不安全，開始到處奔走。

很顯然，要改變這種不安全狀態，各方都需要反思以改變自己的行為。首先，政府需要反思，因為政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關鍵。政府必須理清楚金錢和權力之間的關係。金錢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維繫社會和穩定？GDP主義橫行，儘管經濟發展了，但官員腐敗了，社會整體在相當程度上也遭到腐蝕了。

現在提倡「正能量」並沒有錯，但政府的手段適得其反。例如網絡管控。管控是需要的，但管控方式卻值得商榷。基本上，執政黨所鼓勵的「正能量」反而得不到釋放。

網絡中的有政治思想問題內容的刪除，無論是系統自動刪除，還是人工刪除，都加以把控。有關部門鼓勵社會互相舉報的方法更導致了「精英淘汰」狀態的出現。

與此同時，社會的渣滓成分就乘機浮上枱面，各種「負能量」的謊言、低俗的東西充斥着網絡的各個角落，無人管理。結果怎樣呢？社會上許多謊言大行其道，而有些真話卻成了「過街老鼠」，這種情況使人感到無望。一個社會就如一座大廈，謊言最終支撐不了這座大廈；大廈一旦倒塌，沒有人可以倖免。

企業需要反思，搞清楚金錢和企業之間的關係。財富的最終目的是甚麼？企業如果毫無社會責任感，企業的發展必

然是不可持續的。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倒了，企業必然倒。當錢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個企業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的時候，企業的不安全感並不難理解。現實情況是，企業家不顧一切地賺錢，但一賺到錢就需要馬上跑路，為自己和錢尋找安全居所。

一般社會群體也推卸不了責任，需要反思自身和金錢的關係。權力和資本的橫行是有社會基礎的。人們說，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會有甚麼樣的政府；同樣，有甚麼樣的人民也會有甚麼樣的資本（企業）。人們不應當光指責權力和資本，也應當反省自己的社會道德在哪裏。

中國傳統上有五種基本人際關係，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除了君臣關係之外，其他四種現在都在。不過，它們在今天已經演變成甚麼樣的關係了呢？君臣關係沒有了，但上下級關係又怎樣呢？君臣表現為忠誠，但今天的上下級關係更多地表現為金錢關係，甚至連忠誠也是關乎金錢。賣官、買官、團團夥夥不是金錢關係嗎？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或者可以間接地轉化成為金錢關係的，還有其他甚麼關係呢？簡單地說，就是道德淪喪。當為了金錢甚麼都可以做的時候，人人都是不安全的。

傳統上，中國文化是一個最講究平衡的文化。在長達數千年的農業社會歷史中，中國社會基本實現了各方面的平衡，包括經濟和道德。今天，當中國社會進入一個真正商業

文明的時代，文明的發展則失去了方向。這無疑是對文明的真正考驗。從各種文明的演化來說，金錢構成不了文明。西方在從中世紀的宗教社會轉向近代工業（商業）文明過程中，金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赫希曼在其名著《激情與利益》中對這種作用作了充分的討論。中世紀的西方社會過分道德化（宗教化），與商業革命相關聯的經濟理性剛好平衡了來自宗教的激情。當代的中國剛好相反，當商業革命導致了整個社會對金錢的「激情」的時候，這個文明就迫切需要引入道德來實現平衡了。

道德、文化、價值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而金錢從來沒有產生過這些，也產生不了這些。現實中國社會的邏輯一定程度上是：社會越富裕，道德越墮落。當人們沉醉於中國新（商業）文明崛起的時候，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高樓大廈僅僅是文明的表象，如果沒有新的道德體系的出現，不管多麼輝煌的大廈，也會找不到其意義之所在。文明的崛起和文明的解體，這兩者之間沒有明確的邊界；如果沒有對崛起的深思熟慮，崛起就有可能意味着衰落。

中國年輕一代的金錢膜拜，誰之過？

曾經有武漢的大學生給很多中國人一個似乎是「驚世駭俗」的道德判斷：白毛女應當嫁給黃世仁（地主）；只要有錢，年紀大一些不要緊。於是乎，在中國引起了一場具有道

德高度的爭論，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在互聯網。中國道德衰微的狀態已經持續了一段時期，很多人對此不滿，藉這個機會出來說些話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參加爭論的人的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責年輕一代；他們的結論也同樣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輕人沒救了。

許多國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不檢討自己而只會指責別人尤其是下一代的傳統。每當有這樣的不符合傳統道德價值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會有道貌岸然的人站出來發表道德高論，似乎他們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責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無意地忘記了提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對道德的衰敗負責？從年輕人成長經歷的視角看，要對年輕人道德衰敗負責的不是年輕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輩。

任何人的道德價值觀不是與生俱來的。道德是社會化的結果，是社會灌輸的產物。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中間（無論是「80後」還是「90後」）盛行權錢崇拜和道德虛無主義的現象也是事實。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年輕人是被「培養」出來的。換句話說，年輕人對「權」和「錢」的崇拜意識是他們生長的环境所導致的。權錢崇拜和道德虛無並不是新現象，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了。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尚未崛起，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當時的人們儘管維持着在今天的人看來一種較高的道德水平，但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道德水平。因此，改革開放後，已經難以

承受「貧窮」的一代開始了致富的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似乎沒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當時中國人的普遍「貧窮」狀態有很大的關係，即窮則思變。

金錢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為人們價值的坐標之一了，金錢主義毫無困難地盛行起來。道德衰落了，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於是乎，人們有了金錢崇拜。

在嚐到了初步富裕的果實之後，有的中國人馬上接受了以金錢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國社會的基礎很快就從意識形態（或者道德）轉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最明顯的就是「GDP主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經濟的增長成為了衡量各級官員的重要指標。GDP主義已經高度制度化，儘管最近幾年中國政府想努力扭轉單向面的GDP主義，但成效並不大，可見各級官員的金錢主義概念根深蒂固。（應當指出的是，GDP主義是通過犧牲下一代人的利益來滿足這一代人的利益的。）

一些官員的腐敗，更顯示出道德的衰落。從金錢腐敗的數量來說可見一斑，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幾千、幾萬到90年代的數百萬發展到今天的數千萬甚至數億元。權通過腐敗轉化成錢和財富。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下一輩不產生權力崇拜的心理實在是非常之難的。更為嚴重的是，在歷史上，負責治理並且承擔着教化功能的政府部門的這些腐敗，

其本身也成為了道德衰落的主要的力量。

權和錢各自驅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權和錢之間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這個進程。對年輕一代來說，無論是「權」也好，「錢」也好，只要能夠得到其中的一個，或者和其中的一個靠上邊，就有了自身的價值。

除了權和錢之外，同樣嚴重的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也在迫使年輕人產生權錢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裏，道德的主體是個人。要一個個單獨的個人變成道德人，就要給他們予希望。如果個人可以通過自己正當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希望，那麼這個社會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平。但如果個人失去了這個希望，或者說無論通過自己怎樣的正當努力也實現不了這個希望，那麼道德概念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的年輕人正處於這樣一個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問題。住房是一個人的基本生存空間。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聯繫起來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沒有一個基本的生存空間，道德又能基於甚麼呢？中國二十多年房地產發展現狀，非常有效地扼殺了年輕人的這個「空間」希望。有關方面始終沒有有效的具有長遠眼光的房屋政策，「權」和「錢」操縱、主宰人們的居住空間。對今天中國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在飛漲得毫無止境的房價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難得到一個體面的生存空間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可以責怪他們對權錢的崇拜，因為權錢是他們

得到生存空間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個例子。這些年，人們發現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趨向，甚至也發生農民工的水平較大學生高的情況。這和從前的「腦體倒掛」的情況不同，因為那時「腦體倒掛」情況的產生是因為人為的控制。在今天市場機制調節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這種情況的產生只能說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人應當接受盡可能多的教育，這應當說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但當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兩者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況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虛無化。而年輕人所接受的教育，又不是年輕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的年輕一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曾經造就了一個開放的體制，給予年輕人希望。但現在整個社會似乎被各種既得利益所分割，他們把持着各個領域，社會的開放度較之改革之初越來越小。從前是控制扼殺年輕人的希望，現在則是自由扼殺着他們的希望。年輕人很自由，不過就是機會少。儘管也不時會有年輕人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正當的手段和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包括對權和錢的依附和屈從），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希望則是越來越少。

在此情況下，道德從何而來？不能說國家對道德不夠重視。中國方方面面的話語仍然充滿着各種道德說教，但對年

輕一代來說卻作用不大。道理很簡單，他們所讀到的道德教條和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兩者的差異實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條和道德衰落的現實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輕人對道德的懷疑和價值虛無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說，年輕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自由和物質主義的社會，但這個社會價值混亂、道德衰落。不過，感到更加悲哀的應當是老一代，因為是他們和他們造就的社會培養了年輕一代。老一輩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輩。

提出價值和道德衰落問題絕對是好事情。但要意識到，出現這些社會現象不僅僅是道德價值的問題，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會環境和制度背景。從更高的層次來說，這個問題關乎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道德來自希望，對未來的希望。抱怨、指責和譴責新一代毫無用處，如果要對下一代負責，那麼就要為下一代營造一個能夠使他們感覺到希望的社會和制度環境。而這又是誰的責任呢？